

芮刈川先生訪問紀錄

受訪時間：2014年10月9日，
14：00-17：00

受訪地點：臺中仁愛之家

訪談人：江志宏

紀錄：林冠瑜



受難人資料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	職業/經歷	刑期	與受訪者關係
芮刈川 楊宏永案 27	前青年 205 師運輸 營中士班長陸軍 感訓大隊第 2 中隊 隊員	感化 3 年 1 月 4 日	當事人
案情概況	芮刈川先生，1929 年 1 月 1 日出生，安徽蕪湖人。據國防部及國家安全局等情治單位檔案指稱因涉「楊宏永案」而被逮捕，後交付感化年 3 年 1 個月又 4 日，於 1961 年 3 月 10 日受羈押，1964 年 4 月 4 日感化結束。		

國小教育階段

我在家鄉讀了國民小學五年級，家裡是做生意的，所以還能讀書。家裡不夠富裕，不夠能力，是不能讀書的。那是要能力，那都是要繳學費的啊！都要錢的，你沒錢，可沒讀得了書。家裡環境最起碼過得去，才能夠讓小孩受教育。那時候我們心裡想，現在想起來是七十年前的事了，我今年 86 歲了。七十多年前，我 9 歲的時候開始上學，到現在七十五年前的事情了，早些時候家庭環境不好，根本讀不了書。鄉下孩子，就是家裡環境不好，就是做粗工，也讀不了書。所以能

夠受教育的，老實講程度比臺灣的國民小學程度好很多了。國小上四年就可以寫作文的，老師要你做作文啊。我們到小學五年級，我們叫高小，不叫國小，叫高小。一年級到四年級叫小學。五年級、六年級叫高小，高等小學。

小學後跑船生活

我國小五年級後，14歲，就跟著父親跑船、跑生意。我們講說糧食行，我們是裕豐潤。因為我父親叫做光裕，我的叔叔叫光潤，我父親跟我叔叔兩個名字的，一個裕、一個潤，這個糧食行是我父親和我叔叔兩個兄弟組成的。我從十四歲，那時候是叫小老闆，就跟他跑，跟他學生意。我們就不像人家請個總經理，請個業務，過去我們叫掌櫃，我們請老掌櫃，大掌櫃、二掌櫃，現在說的會計，就是老帳房，會計、帳房、夥計，現在叫業務員。在安徽，蕪湖那邊。因為蕪湖那邊是四大米市之一，是糧食的進出口地，然後再大批的送出去。市場是米市，表面講米市，其實除了米之外，還有一個大眾的就是菜籽，做榨油的。米、菜籽、黃豆，就是各地產，在我們市裡集中，整片就等於是個市場，大市集。

中日戰爭的影響

到了民國27年(1938)、28年，我們就守不住了，南京就沒辦法，那時候就逃難往鄉下跑，因為帳都失去了嘛，那時候我們家裡一行人，夥計、管家、老闆啊，我媽媽啊，我祖母啊，還有外祖母，我們就逃到鄉下去避難。等到整個失守了，整個被佔領了，沒辦法，失守了，一開始很亂，事後大概半年之後，才慢慢一一安靜下來。他已經佔領了，就不用打民了。成立偽政府，汪精衛啊，他就做這個偽政府。那時候我們等於是被日軍統治殖民啊。表面上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管自己，汪精衛組織政府嘛，他派人派地方有名望的人來出任縣長啦，後來甚至這些人都變成漢奸啦！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你要生存下去就這樣啊。能夠生存就生存下去嘛，等到市民都知道被日軍佔領了，已經穩定了，我們再回來。那就是在日治時代下謀生存的。

加入青年軍

抗戰勝利了之後反而更亂，為什麼呢？那時候勝利了，中國有六百萬部隊，一勝利不打仗，日本人投降了，我們這些軍人就裁一半，每個人發三個月的薪水，你們就回家了。這一裁，搞得大陸大亂。為什麼？第一個就是薪水少，第二個就是交通不方便，大陸土地這麼大，有人南方人，部隊在北方，有人北方人，部隊在南方，你發三個月的薪水，那時候一個月的薪水，大概是現在的一、二千塊錢，你發個二、三千塊錢，你要人家回去，回得去嗎？連回家的盤纏都不夠啊！那時候起碼有一半的人就變成共產黨。國民黨看這不對，國民黨留那個軍官總隊、輔導召集啊，你不能回家，每個縣市成立輔導會啊，回不了家、沒錢回家的，先是婦人會，再來排長、再來連長，這樣國家還是看怎麼樣再慢慢處理，慢慢回去。勝利之後，亂得一塌糊塗，十年後大家反而還有一個偽勝利者，大後方，重慶、四川、貴州，回來幾十萬，勝利了，日本人投降了。這幾萬人比日本人更壞，一會兒要房子，要銀子，什麼都要。勝利不是你們打的，是美國兩顆原子彈，丟在廣島、長崎，日本人才投降的，不然日本人是不投降的。結果日本人一投降，亂七八糟，共匪就趁機會起來了。所以就把國民黨越搞越亂，所以到了 37 年，打得搞得一塌糊塗，38 年退到跑到臺灣來了。民國 36 年加入青年軍，二〇五師在上海。那時候我家很嚴的。剛才我說跑到上海，我有一個表兄，在上海擔任公務員。我想能不能找他。那時候我先暫住他家找工作，找不到工作，正好看到二〇五師正在招人，一個半月之後，人就差不多了就到臺灣來了。

來到臺灣

我民國 36 年就到臺灣，因為那時候臺灣二二八事變，來到了臺南永康的砲校。大概民國 37 年，我到鳳山軍事隊受訓，就是現在的陸軍官校，早期是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¹，不是官校，只是第四軍官訓練班，班主任就是孫立人，我們訓練班裡面，軍事隊，我就被留下來當教育班長，訓練出來就變成軍官。

¹ 1947 年 10 月，本班成立於高雄縣鳳山鎮，初定名為陸軍軍官學校臺灣軍官訓練班，後因各軍官訓練班相繼成立，乃改為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分班。在組織上隸屬於成都本校，指揮上歸位在鳳山的陸軍訓練司令部，由司令官孫立人將軍兼班主任。1950 年，因應中華民國政府遷臺，陸軍官校於高雄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位址復校。

我是軍訓班第十八期畢業，派我到基隆，第二總臺，去當分臺長。在步連隊等於排長，中尉分臺長，在中崙那邊。那時候是機場，中崙又靠機場一點點，那是高射砲，我們分臺有十二個高射砲。當分臺長，因為我們是要塞性的，不是流動性的，部隊人員是流動的，要塞就是從新竹到基隆，另外臺灣還有澎湖要塞，臺灣有三個要塞。現在都沒有了。這個時間住在基隆的和平島那邊，還調到第二總臺，就是對空的，對高射砲。總臺在淡水，臺灣是屬於第二大臺，日本是第二營的。

二二八事件聽聞

剛來臺灣時有聽過二二八事件，我們就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而調過來的。因為二二八事件早期二十一師很亂的，處裡案子搞不好就調回去了。那時候的行政長官是陳儀吧！行政長官陳儀，沒把二二八事件處理好，就鬧得很大，所以政府方面也很憤怒。部隊壞，那時候叫白崇禧來安撫。白崇禧是大陸第三方面的總司令，他住在上海，白崇禧是第三防衛軍總司令。那時候在大陸有十個防衛軍。第一軍就是我們的胡宗南，他在西北那邊的，第一總司令。我們來的時候，在臺灣本身就有一個保安司令部，那時候保安司令部是彭孟緝，他去處理很多事情，我們在他後面，他把事情處理過了，有很多事情處理的手段方面是比較激進的。那時候兩個大人物出名，一個是保安司令部，第二個就是高雄要塞司令部。彭孟緝的保安司令，兩個人出來主持行動手段比較激烈一點。抓了不少人，走了很多人，為了二二八這個事情，事情鬧得很大。

民國 37 年調到鳳山受訓，在我受訓的時候，二〇四與二〇五兩個師就調走了，後來又調二〇一、二〇八過來，那受訓完之後就派到基隆當分臺長，不到一年才到中崙那個，住在基隆和平島那邊，基隆第二總臺，對空高射砲，總臺長在淡水，第二大臺，第二營的，我是第二臺的第六臺。

入獄經過

大約在民國 36 年年底，現在叫輔導長，每一臺就叫指導員，那個時候指導

員的權力由黨控制，部隊開會搞那個「良心會」，何必搞這個名詞，教阿兵哥講話要憑良心，誰講話不是憑良心呢？實在是很幼稚無聊。我們開小組，我說開會就開會，開什麼良心會呢？叫三十個人開會，後來我就起了反感，我說沒有這個必要嘛！每天從早到晚都在身邊嘛！何必去搞那個小動作，都看得很清楚的，你何必去幹這種小動作。我那時候是中尉軍官，我很多事情都跟上面唱反調。在部隊裡面唱反調。我說我們軍人，我們是國家的軍人，中華民國的軍人，我們不是國民黨的軍人。我們是公務員，不是黨員，我覺得我的觀念很正確。

但是他們覺得我很有問題，我哪裡有問題？他們那種行為才是破壞軍人團結，在裡面搞分化，我很多行為不能說百分之百，起碼百分之 70 都是反對的。他們就把我送到保安司令部，說我思想有問題，說我搞分化。就在某個我不知道早上，外面的人敲門，兩個憲兵，叫我到外面談話，一輛吉普車，有一個司機和一個班長，就被抓上車。從臺北中崙，一直開一直開，開到臺北橋，那個憲兵司令部的特高組，果然是說我思想有問題。把人送到司令部看守所押起來了，就把帽子扣下來。先到憲兵司令部，在司令部看守所坐了半個多月，之後就到了軍法處，就是現在的來來大飯店，青島東路三號。

被用懲治叛亂條例判刑十年。我從民國 39 年被判到 49 年滿的，三年感化，沒有假釋。那時候我是叛亂，沒有假釋，坐好久；你普通犯，判十年、坐五年可以放出來啊，提早去做兵的都有。但是叛亂犯沒有，那時候有四個沒假釋。第一個，叛亂犯，沒假釋。第二個是煙毒犯。第三個貪汙犯，第四個是殺害直系親屬。在軍法處²的時候，房間很窄，住了很多人，又悶又熱，住八個人，最多十個，最少六個。六個到十個，就一個排一個，一個排一個。睡覺的話就我碰你，你碰我，這邊睡一個，那邊睡一個，一個椅子就可以睡三個人了。就那麼克難。在那裡什麼人都有。殺人的啊，侵害人的啊，打人的啊，貪汙的啊，什麼人都有。後來在新店的監獄也待了八年多。又在生產教育實驗所³，生教所待了三年一個月。到新店，那時候他們就分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興、

² 警備總部軍法處及國防部軍法局位於臺北市青島東路三號，約今日忠孝東路、青島東路、鎮江街及林森南路之間的區域，其中北邊二分之一範圍是現在喜來登大飯店所在。在白色恐怖年代，許多政治犯被逮捕後就先送至此處拘禁與審訊，等待判決結果。

³ 生產教育實驗所（簡稱「生教所」）1954 年設立於臺北縣土城，於 1972 年改名為仁愛教育實驗所（又名「仁愛莊」），是短期感訓者感化的場所，也是大多數政治犯開釋前最後的考核站。這裡採軍事學校的管理，以思想改造為主。生教所裡曾有不少女性受難者，帶著小孩坐監。

國。我們政治犯就是仁、義。我那時候出來就打雜，打飯啊、放飯啊、喝水啊、照顧大家啊。後來就在前面表現良好的，就留下來，表現不好的，就送到綠島去，最後仁監也撤掉了。之後就轉到板橋土城新店教育所。我五十年就轉到生教所。生產教育訓練所女生很少，大概五十、六十個人。我到仁教所，工作越來越多。那裏有五個班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班是女生，女生很少，大概五十多個人或六十個人。我到仁教所，工作量越來越多。它下午是生產教育。生產教育看你的智慧，你是大學教育，高中程度、初中程度，以前不識字等等，甲乙丙丁。我是分到一班，高中程度。

後來出獄要找保人才能出獄。後來找到皮鞋店的老闆，上海人，做皮夾的，皮夾很有名氣很好，很高級，老闆過去也是政治受難者，坐了七年，然後出來就開皮鞋店，就是他給我保的。另外一個保人是生教所的一個工友，我們感情很好，他在板橋糖廠，出來我就開始找工作。白色恐怖的事情總共讓我關了，包括感化總共十三年又三個月。

出獄後

出獄後，做了很多工作，但都做不久，那時候民國 50 年，老蔣還沒死，還是每個禮拜還要到派出所報到。可是警察有時候故意難得來看看你，老闆一看想說怎麼搞得，警察來看你。嚇壞了，這個問題就是紅帽子，大家都怕被扣上紅帽子。老闆就趕快把薪水發了。到機場做了一個多月，也是警察來談，搞得我沒辦法，就跑到橋頭做臨時工，打地窖，鋪水泥，那時候住在華西街那邊，他們都會派人調查我的生活環境。後來到殯儀館工作，做啊做啊做，做久了，做死人工作，我膽子很大心很細，我做了幾次之後，老闆說不錯你很能幹，盡全力把它做好，賺他的錢也是心安理得。本來是在臺北，之後跑去高雄，做了快十年，到臺中，臺中殯儀館做了三十年。憑良心講，就這個工作對我最好。家屬都對我畢恭畢敬，我們都不敢做黑的。我還幫屍體化妝，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。最可怕的就是孤單老人，一個人住在家的，三天、五天、十天，味道出來被人發現。連管區都轉個彎不敢進去。沒人敢進去，只有我。只有兩個人

1955 年至 1987 年間，共羈押 2260 名「新生」，傅正、崔小萍、謝聰敏、魏廷朝、李敖、盧修一、呂秀蓮、陳菊等，都曾被關押在這裡一段時間。

進去，戴口罩，手套，塑膠套，捆屍袋什麼的，那個在床上，你一搬都散開了，把塑膠袋打開慢慢的移啊移啊移。兩個套子，把頭抬起來，一下子撐起來。那個味道真是，比大便還難聞簡直是。有人一聞就昏倒了。跳樓、過水，舌頭斷的都有，都要去處理。被刀砍的，女生有時候被強暴致死，法醫看了，都要我們做啊，要採女內體的基因，從陰戶裡面慢慢轉啊轉，取男性的精液啊等等。剪女人的指甲，法醫動嘴巴，都是我們的工作人員來做。困難的，可怕的，好可怕，腿斷、手斷的，皮都拿起來，慢慢的把他縫好，臉縫好，都要很小心、很細心，你做的粗魯，家屬看得心疼，你仔細很好，慢慢細心地做，家屬看了很感動。他除了給你薪水，還會另外加紅包給你，謝謝你。不管是怎麼髒，大便、小便，我們一定幫他清得很乾淨。

申請補償

民國 89 年的時候就領到補償金，我領得不多啦，二百多萬啊，我知道最多可以領到六百多。我記得發我們回復名譽是陳水扁，補償名譽也是陳水扁。在一個大禮堂，我們接受回復名譽嘛，每個人發了證書。一批一批發，下面拍照。陳水扁和呂秀蓮，我們站一排，十個人一組，有七百多個人，去政府領錢，叫補償基金會，在中山北路那邊。

人生感想

我覺得是命運安排了一切。如果我沒遇到這個事情，也許我今天早不在了。也許我運氣好，我出來就當官。我同鄉，我同班的，他是第二名，他當國防部的中將，叫做王天儀，第二分隊，我第四名，他第二名，是我同班同學。因為我不是，以我的性格，進砲校再進修，人也是一步一步爬的啊，扣了一頂帽子，我變成思想犯，那我在關的時候才知道，我還活著的同學，我們感情很好，那個海軍說，還有人半夜被丟到海上的。人生就是這樣，你想開了就沒那個苦了。人生之苦，短短幾十年，想那麼多幹嘛？想開一點啊，不然怎麼辦？很多人比我早走，都比我年輕啊，我同班的比我年輕啊。看開也好，放下，不要計較，一點小事去斤斤計較，提得起、放得下，人生短短的幾十年，何必自己虐待自己？你想想你

過去後悔，感覺痛苦，也犯不著，事以致此，你痛苦、懺悔也沒用，何必往那邊看，我們已經習慣，我們可以做個旁觀者，我們看看這個社會，現今怎麼走，還不錯啊，人做旁觀者，欣賞也不錯啊，所以把自己心情調適一下也很好，未嘗不可，人能適時調節自己，不要猛想過去，你一再想，退一步，海闊天空，是不同的，也就沒痛苦了。

與「匪諜」楊宏永的關係？

檔案中寫我和以前的匪諜叫做楊宏永有聯絡，這都是被逼，被亂搞出來的，根本沒這件事。因為要是真的有這些人的話，我可能就不在了，不可能會判那麼輕了。那時候很簡單，只要帽子給你扣了之後啊，甩也甩不掉。我跟你講，十五、六個學生抓過去判七年，真得很可惜，很可憐。你嘴巴不能隨便講話，一講他就套你，現在一定要請律師，早期沒有的。